

刍议陈伯衡与20世纪的金石学发展^①

元国霞

摘要：于20世纪金石学和西泠印社发展而言，陈伯衡都是极为关键的大家，但时下已有研究极少，亟待挖掘。本文通过研究相关历史文献、图像资料 and 理论分析，考察其于彼时金石学发展的贡献。首先探讨其为《东南日报》之《金石书画》编辑时所作出的贡献。该刊物发行的四年间，大致有三年是在他家编辑。并通过剖析其刊载其中的著作、藏品，如《历代篆书石刻目录》（局部）和《汉西狭颂》（宋拓本），窥见其于20世纪乃至整个金石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之后就其碑拓题跋等细致分析其碑帖鉴定方法：技术派、学术派、艺术派三者兼善，而以前两者为主导。最后通过挖掘其与道友们的金石交游，如与余绍宋的金石往来，和受沈慈护所托整理沈曾植遗迹、藏品等，想见其在业内的重要地位和助益彼时师友同道的金石事业发展等。

关键词：陈伯衡 20世纪金石学 《金石书画》 鉴定 交游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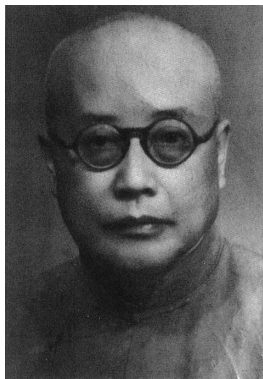


图1 陈伯衡像，见浙江省博物馆编：《金石书画》第三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时至当下，素有“碑帖大王”之称的陈伯衡（1880—1961）（图1），于西泠印社、江浙沪地区抑或是20世纪的金石学都是极为关键的大家之一，却依然是学术界的一个“谜”。虽然学术界于近现代书学、金石学的相关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但似乎因资料缺乏而频频“绕开”陈伯衡，对其的研究进度极为缓慢。时下能见到的研究文章有朱妙根、黄镇中《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陈伯衡与他的碑版金石考据》，王巨安《碑帖大家陈锡钧》《叶为铭佚稿〈浙江石刻石师录〉与陈锡钧》等少量几篇，其他则是散见于相关论著之中，如与西泠印社有关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陈振濂主编）、《西泠群星》（林乾良著）等，但也不多见。本文以其作为《金石书画》编辑时的成就展开，剖析陈伯衡的藏品、论著、鉴定方法以及其对道友的助益等方面的成就，探讨其对彼时金石书画发展的意义，“为土壤细流之一助”。

陈伯衡，名锡钧，江苏淮阴人，室名为石墨楼。于金石书画相关的职务有：西泠印社早期会员、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专门委员、浙江省通志馆编纂、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史

^① 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0世纪中国篆刻与西泠印社之关系研究”（20BF075）阶段性研究成果。

研究馆员、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还曾担任《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编辑、浙江文献展览会筹委会金石拓片组主任、上海文献展览会发起人之一等。擅金石碑版和书画研究，著有《历代篆书石刻目录》、《枫树山房帖目补编》、《石墨楼金石见闻录》（图2）、《翁松禅金石学》、《叶鞠裳金石学》等。从其担任的学术类职务和论著成果等便能看出其在近现代金石界的分量之重。1956年，夏承焘在向时任浙江省文教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黄源介绍浙江文化时，特意强调了“钱南扬之南戏学及韩登安之浙派印学、陈伯衡之碑帖学”^①。可见陈伯衡的碑帖研究成就于彼时浙江的地位。



图2 陈伯衡《石墨楼金石见闻录》封面，见浙江省博物馆编：《金石书画》第三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页

陈伯衡收藏宏富，如浙江省博物馆编的《方寸乾坤》一书中记载：

金石碑版学家、西泠印社社员陈伯衡在1960年曾将一万余件碑拓捐入浙江图书馆，一年后陈伯衡过世，又四年后其夫人将所遗存的书画篆刻旧藏170余件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②

此处所说的一万余件（历经60余年，已经整理可供世人观摹研究的依然非常少）并非其经手或收藏的实际数量，如其曾于1938年刊载于《申报》上的赈灾义卖《开成石经》的信息中遗憾道：

“继思研究金石垂五十年，搜集拓本达数万种，事变而后，虽则半付劫灰，然孤本及宋明旧拓，尚存什一……”^③经历过“半付劫灰”后还有如此惊人的金石碑版书画藏品数量，近现代难有其匹。

①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承焘《夏承焘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页。

② 浙江省博物馆编：《方寸乾坤》，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③ 《赈济华北灾荒 各业策动捐款 沪市热心人士关念灾胞处境 将家藏金石书画囑本义卖》，《申报》1943年5月22日，第24829期第4版。

除数量十分惊人外，其“对于历代金石、碑版之学，研究甚深。……同一碑阙，可能有数种拓本，彼能从某处之残损而定其拓制的具体年代。在江南一带，对金石拓本收集之完备与研究之深邃，陈氏实为第一圣手”^①。

一、担任《金石书画》编辑：于金石碑版传播推广功勋卓著

“一九三四年六月，《杭州民国日报》改名为《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邀约余绍宋创办《金石书画》。是年九月十五日，《金石书画》正式创刊，逢五出版，月出三期。后因经济原因，改为半月刊。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停刊，共计发行八十七期。”^②《金石书画》（图3）的出版初衷主要是延续“保存国粹、振兴国族”的理念。余绍宋在该刊物《发刊词》（图4）中也强调了这一宗旨：

金石书画之有裨于学术与人生，而为一国文化之表现，夫人知之，不待言矣。顾藏度之家，恒喜称秘，不以示人，穷僻之乡且弗论，即都会中寒畯之士，亦有终身不获睹先民之奇制剧迹者，遑论有众。夫温故知新，古有明训，吾国苟欲跻于真正文明之域，自非阐扬固有之文艺不为功。而欲事阐扬，则必以所固有者广播于有众，使古人精神所寄，渐以浸渍于人心，有所观摹，有所凭藉，庶足以发其兴趣，油然而生敬爱故国之思，而乐于从事，以渐臻夫发扬光大之域，此不易之义也。^③



图3 《金石书画》合订本第一册封面，见余绍宋编：《金石书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图4 余绍宋《金石书画》发刊词，见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一期第一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余绍宋身居高位又学养深厚，号召力强，故响应者众，该刊物得到了多位文人志士的支持，其中出力颇多者为另一位重要编辑陈伯衡。余绍宋愿以此刊物“阐扬固有之文化……广播于大众，

① 林乾良：《西泠群星》，西泠印社2000年版，第125页。

②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影印说明，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③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一期第一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使古人精神所寄，渐以浸渍于人心……油然生敬爱故国之思”。陈伯衡与其志趣同一，如在为余绍宋藏《嘉兴府铜漏壶铭》题跋时感慨：“金石一门，遂使金石遗文，淹没不彰，日亡日少，文献无征，可为叹惜。”^①他又在该刊物第三十五期第三版的《艺苑珍闻》中说：

自泰西影印之法行，古墨已有续命之汤，近更有珂罗版及金属版两法，在印刷界开一新纪元。若《临川李氏十宝》、杨惺吾《寰宇贞石图》在昔视为鸿秘，在今已成筌蹄矣。……迩来攻金镂版《兰亭》有换骨之丹，脱影写真，艺林广赏心之乐，化神品为千种，临池家如得来禽，聚仙翰于一编，操觚者胥窥全豹。^②

陈伯衡愿借刊物之影印“化神品为千种”，让普通大众较易获得且为临池之依托。

《余绍宋日记》中多有记载陈伯衡为此刊之付出。在编辑此刊物之前，两人便已熟识，常有碑帖往来，如：

陈伯衡来谈并观旧藏诸拓片，晨来午始去。^③（1931年7月14日）

高鱼占复属为《准园寿苏第二图记》，因濡笔为之，文曰：……淮阳陈伯衡锡钧已先后来入社。^④（1933年1月12日）

夜陈伯衡来久谈，告余宿迁王氏所藏书画古器甚精，皆明末时所置……其主人名汝杰，号柯庭，与之相识，它日当介我往观云。^⑤（1933年5月24日）

访陈伯衡，以为方聘三书画扇交之。……从伯衡处借颜书《八关斋会报德记》拓本发奋临之。^⑥（1933年11月11日）

从这几则题跋中可知陈伯衡与余绍宋同为“东皋雅集”成员，常就碑帖的鉴赏、鉴定、临习、交易等互通有无。自1934年《金石书画》创刊，陈伯衡便在第一期刊载了《开皇兰亭真本》拓片等。

虽然《金石书画》由余绍宋担任主编，但许多编辑工作都是由两人共同完成或由陈伯衡独立完成。时下能查找到的关于陈伯衡较多参与此刊编辑工作的时间大致是自1935年2月起。如余绍宋在《日记》中记有：

编定《金石书画》特刊七期，交伯衡代理。^⑦（1935年2月25日）

①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十四期第二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②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三十五期第三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③ 黄国平、余晓主编：《龙游文库·余绍宋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961页。

④ 黄国平、余晓主编：《龙游文库·余绍宋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68-1069页。

⑤ 黄国平、余晓主编：《龙游文库·余绍宋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97页。

⑥ 黄国平、余晓主编：《龙游文库·余绍宋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34页。

⑦ 黄国平、余晓主编：《龙游文库·余绍宋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40页。

据《日记》显示，之后余绍宋编订此刊基本都是前往陈伯衡家，如：

赴陈伯衡家编《金石书画》特刊稿。^①（1935年6月19日）

晨赴伯衡处编特刊。^②（1936年7月28日）

访陈伯衡编特刊两期。^③（1937年4月4日）

直到1937年8月刊物停办，三年间余绍宋都是前往陈伯衡家中一同编辑，足见陈伯衡的付出。而且陈伯衡多次在刊物的《编辑余谈》《艺苑珍闻》版块以编辑身份发表说明和观点（作者基本为余、陈二人），如：

笈江上画传世较希，今所流传皆属山水，未闻其能写梅也。本期所刊寒柯堂藏本，用笔超逸绝伦，题句尤妙……^④

钝鼎以二十一年春在寿县出土……字均铸而非铸，惟铸有文字者亦复不多余，仅得钝鼎拓本一种，其余尚待搜访。^⑤

摹印亦专门之学，非精研小学，兼工篆籀，不能出色……本刊商之丁、高、俞、朱四君，允将藏印酌假制板，众本期起先将高君藏印择尤陆续刊布以飨阅者。^⑥

陈伯衡在《编辑余谈》中所谈论的涉及金石书画多方面内容，学养深厚，思路开阔。

作为金石碑版方面的大藏家，自然会在刊载的藏品方面出力颇多，如该刊物共八十七期，陈伯衡拿出了五十多件藏品，有些藏品如《汉西狭颂》（宋拓本）分期刊载了25次，可见其重视程度。其刊载藏品自商朝至清朝的刻本、碑刻、摩崖、墓志、墓砖、造像、石权、塔铭、画像砖、印章和钟、鼎、簠、铜漏壶等青铜铭文之类，涉及金石书画等多个方面，为其中刊载较多者之一。此外陈伯衡还常为刊载的他人藏品作题跋、写评论等。

《金石书画》是在传统文化亟须振兴的关键阶段顺势而生的，是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学科分类趋于细化之时难得的全面呈现金石书画成果的期刊，参与者众，如刊载藏品涉及的藏家有吴湖帆、高野侯、顾鼎梅、黄宾虹、邵章、陈汉第、杨复、童大年、高氏三兄弟等五十多人，相互之间还有点评题跋之类，极大地促进了金石书画家间的交流往来，加之几年中刊载如此多的世人以往难得一见的精品，极大地推动了金石书画等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为仅次于主编余绍宋的编辑，陈伯衡功莫大焉。

① 黄国平、余晓主编：《龙游文库·余绍宋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78页。

② 黄国平、余晓主编：《龙游文库·余绍宋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70页。

③ 黄国平、余晓主编：《龙游文库·余绍宋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17页。

④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三十一期第四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⑤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三十一期第四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⑥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三十三期第四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二、其论著、藏品对金石书画发展的推动

除了作为编辑刊物且刊载藏品数量颇多外，陈伯衡刊载的许多藏品还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如珍稀鲜见的版本、新发现的碑帖和未发表的论著，或对金石书画发展有独特贡献者，《琅玕台刻石》《开皇兰亭真本》《魏三体石经》《唐阙特勤碑》《隋李威猛墓志》《汉西狭颂》等拓片皆属此类。正如余绍宋在《金石书画》的《发刊词》中强调：“一、习见之金石、寻常之书画，不录。二、有关于金石书画之著述，非稿本或有刊本而流传甚多者，不录。”^①此处试剖析几例便能知晓陈伯衡于20世纪金石书画发展的重要性。

（一）《历代篆书石刻目录》

在陈伯衡整理的《历代篆书石刻目录》（图5）成稿之前，似乎还未有过专门的关于历代篆书石刻方面的整理资料，此举可谓首创，史料价值极大，于彼时的金石、书法发展意义非凡。关于其重要性，陈振濂先生曾在《金石学宣导的新契机——〈金石书画〉发刊词》中强调：

以金石学成绩而论：一是西泠印社前辈陈伯衡首次连载发表《历代篆书石刻目录》，二是缪荃孙编《浙江金石分地编目》未刊稿本，皆有助于推进金石学当代复活，重现辉煌事业，而为当时吾浙以外他处所未见也。^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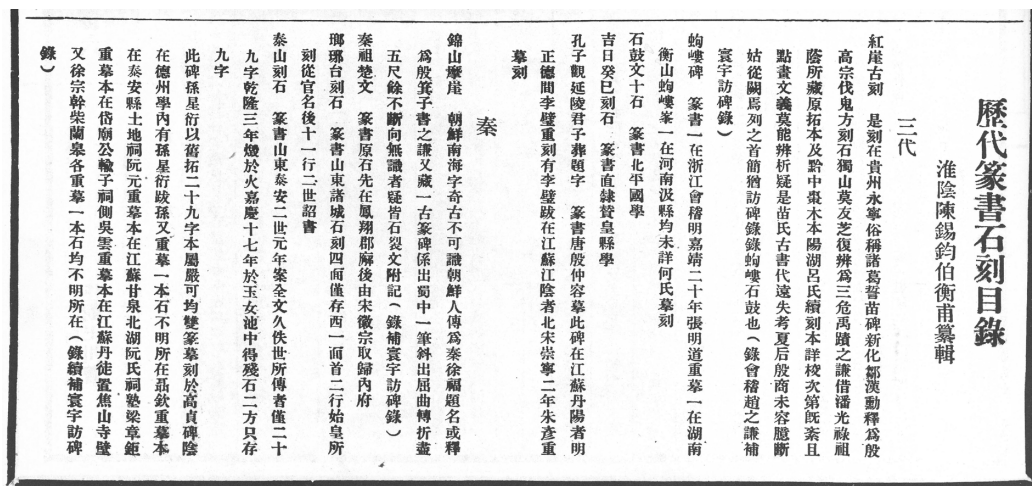


图5 陈伯衡《历代篆书石刻目录》（局部），见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四十六期第三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陈先生对其重要性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金石书画》自第四十六期至八十六期不定期连载了《历代篆书石刻目录》十九次，从三代到金代的篆书石刻条目近400条；加之因战乱停刊，金代之

①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一期第一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② 陈振濂：《金石学宣导的新契机——〈金石书画〉发刊词》，《西泠艺丛》2016年第8期，第74页。

后还有700年的条目未见刊布，据此可以想见完整版的。该目录中的条目来源于全国多个地区，有些是采自著录，如“录会稽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等，有的自实地考察得来，亦有自家或道友的藏品。

在陈伯衡之前及同时代，与该目录有一定可比性的有商承祚《石刻篆文编》，其他则少见。该书是商氏自1929年任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代主任时开始编著的。两者在编写时间和编排方式方面有些类似，都是按朝代区分，但陈伯衡是广泛搜罗，尽量齐备；而商承祚只采用了“包括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吴、晋，品类以碑刻、碑额、题字的数量为多，合计九十五种”^①。在时代长度、种类、数量等方面，商氏的无法与陈氏的相抗衡。当然，这也许是因商氏更注重将同一字双钩汇总，在选字方面有所要求，以致不如陈氏的齐备和深入。

《金石书画》刊载了多件篆书作品，其中也有陈伯衡的藏品。虽然时下还无法窥见该目录的全貌，但从多个方面都能看出，陈伯衡对历代篆书石刻资料的整理，和对彼时篆书艺术的发展都起着较为关键的作用。

（二）《汉西狭颂》（宋拓本）

《金石书画》中分二十多期连载了陈伯衡旧藏的《西狭颂》（宋拓本）全篇，可见其对此拓本的重视程度和与广大同仁分享的意愿。为了使读者能明确了解宋拓本与其他拓本的差异，陈氏还在首次刊载的第三十六期的第二版和第三版发表了《西狭颂》同一部分的宋拓本（图6）和清初拓本（图7）。通过比较发现，清初拓本较为粗壮，为后世颇为常见的面貌，而宋拓本则与之差异巨大，如余绍宋在题跋中所说：

往见《西狭颂》旧拓本，笔画肥钝，颇疑汉人无此种体态。及见此拓用笔细挺，神味隽永，极刚健婀娜之致。其波磔俱尖锐而藏锋，已渐开正书之体势。与世传旧拓本，真有霄壤之别，始知是碑曾经俗人刊凿修改，真意全失，不足观矣。其被刊凿当远在清初以前，历时甚久，故前贤无论及之者。此拓当为海内孤本，烟墨甚古，必为宋拓无疑，虽残缺百余字，不足为病。石墨楼中有此尤物，足以豪矣。^②

① 商承祚编著：《石刻篆文编》自序，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②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八十五期第一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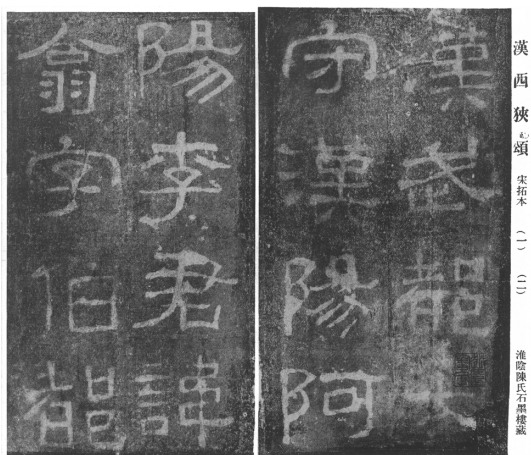


图6 《汉西狭颂》（宋拓本）（局部），见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三十六期第二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图7 《汉西狭颂》（清初拓本）（局部），见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三十六期第三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余绍宋说“往见《西狭颂》旧拓本，笔画肥钝”并非个案，如祝嘉在《论“汉三颂”》一文中也称“《西狭》则纯肥”^①。但也有不同评价如康有为称“疏宕则有《西狭颂》”^②；徐树钧誉其“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非复可以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意趣”^③。康与徐眼中的《西狭颂》“疏宕”“疏散”“飘飘云中”，则肯定不是“肥钝”一路，虽然时下无法得知二人依据哪个版本有感而发，但该宋拓本“用笔细挺，神味隽永，极刚健婀娜之致”，较清初拓本而言，应更契合二人的审美评价。

从两个版本差异巨大，且宋拓本比清初拓本瘦劲许多，线形多有不同，不大符合磨崖正常的自然磨损所致，余绍宋推断此作曾被人“刮凿修改，真意全失”，对该摩崖的遭遇和风格变化提供了新的思考。陈伯衡将两种拓片并列刊载，也有此意。

时下我们常见的字帖主要为这类偏粗壮的清初拓本风格，据陈伯衡和余绍宋的说法，清末以来大多如此，而少见康有为等人眼中的“疏宕”之意。该宋拓本的出现对《西狭颂》的风格定位提供了另一种美感演绎和思考，且通过“其波磔俱尖锐而藏锋，已渐开正书之体势”的形态思考《西狭颂》与楷书发展的关系。余绍宋曾多次借此拓临摹学习，其言：

余借临十数过，因得略窥汉人用笔之妙，深自欣幸，遂题其后。丙子初夏，余绍宋书于寒柯堂。^④

通过余绍宋的实践可知，该宋拓本为《西狭颂》的认识和探索增添了新的路径。1958年受沙孟海之嘱，陈伯衡为其所藏《西狭颂》的清拓本题跋，跋文中对版本细节的论述极为精详，可看出业

① 祝嘉：《论“汉三颂”》，祝嘉《书学论集》，金陵书画社1982年版，第60页。

②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24页。

③ 叶德辉等撰，湖南图书馆编：《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第二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78页。

④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八十五期第一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内对陈伯衡在《西狭颂》版本等方面研究高度的认可，以及后世对该摩崖的重视程度。无论从金石学发展和艺术探索方面来说，陈伯衡的《西狭颂》（宋拓本）都具有时代意义。

此二项也许还不能完全代表陈伯衡的藏品价值。因其藏品非常之多，此处列举一二以窥冰山一角。

三、其金石碑版鉴定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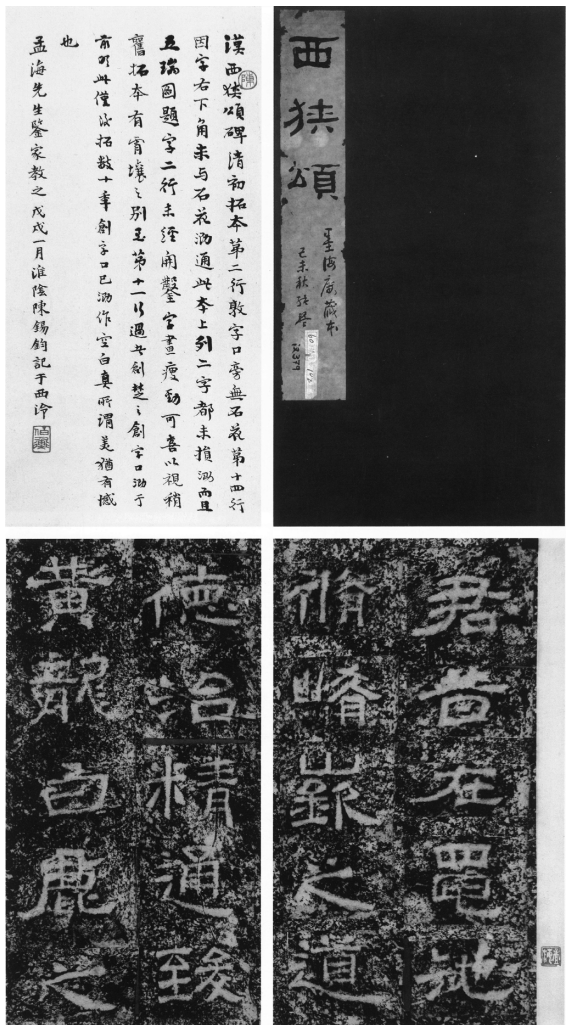


图8 《汉西狭颂拓本册》（沙孟海旧藏）（局部），见浙江省博物馆编：《金石书画》第四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页

陈伯衡的碑帖鉴定方法十分多样，若以当代书画鉴藏三大流派艺术派、技术派、学术派（代表人物依次为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来论的话，他三者兼有。这一方法在其碑拓题跋中随处可见。如其为沙孟海题《汉西狭颂拓本册》（图8）时记有：

汉西狭颂碑，清初拓本第二行“敦”字口旁无石花，第十四行“因”字右下角未与石花泐通。此本上列二字都未损泐，而且“五瑞图题”字二行未经开凿，字画瘦劲可喜，以视稍旧拓本有霄壤之别。至第十一行过者“创楚”之“创”字口泐于前明，此仅后拓数十年，“创”字口已泐作空白，真所谓美犹有憾也。孟海先生鉴家教之。戊戌一月，淮阴陈锡钧记于西泠。^①

由跋文可知，陈伯衡对碑拓的每个字口在哪个阶段是什么样子几乎都能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有如《西泠群星》中称誉：“陈伯衡因为学识丰富而致眼光敏锐，各种拓本只要略一展示，即知其是否罕见，价值若何。”^②

虽然陈伯衡对金石碑版研究极多，经验丰富，但仍然十分重视前人的研究基础，对前人或时人的研究状态烂熟于心，注重藏品的文献著录、流传脉络和历史品评等。其在碑帖题跋或作批注、记录时，常以阐述前人的观点为基础，进而进行拓展和评价，而非凭着自我感觉和固有经验率意定夺，学术意识非常强，有如启功以文献著录考订见长的“学术派”鉴定手法。如其在自编的

① 该作品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藏品编号为029736。

② 林乾良：《西泠群星》，西泠印社2000年版，第125页。

《石墨楼金石见闻录》第一卷中记录《秦琅玕台刻石》一则云：

《秦琅玕台刻石》，旧在山东诸城琅玕台，现已运至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系摩崖刻石，下临东海。往岁石裂，知县宫懋让曾镕□。东之字虽漫漶，究留一方秦篆，咸因以浚石，忽失所在，或云触电，或云实坠海中，秦刻遂绝于天壤。此碑自阮伯元命段苓精拓，后传本始多，“五大夫杨轲”之前一行，尚有“五大夫”三字可见，末行“制曰可”三字亦极明晰，共得十三行，最为难得。潍县陈簠斋监拓尽。刘去卫公，历年不久，其言必有所据。《广川书跋》极翹其言，伪托之说，不攻自破矣。^①

陈伯衡在该文中将刻石具体的遭遇、损毁程度、拓制、真伪、某个时期的某字清晰与否、旧时论著中的观点等——道来。若是《秦琅玕台刻石》备受世人关注，致使陈对其较为熟悉，但他的其他题跋亦是如此。如其为好友余绍宋跋《隋城皋公扈志碑》时亦有非常深入细致的论述：

《隋城皋公扈志碑》，见《校碑随笔》及《艺风堂金石目》两书，一云石不知所在，一云石在陕西咸阳。此外，王文敏公懿荣、江阴缪小山先生各藏一本。往岁余在沪上，得一剪裱本，为之狂喜，如获瑰宝。按隋书《无扈志传》，曾祖及祖均仕元魏，亦皆无传可考。碑字结构谨严，已开初唐风气，此系整本，尚未剪裁，且有碑额，益可珍已。越园先生鉴家属题。甲戌冬，陈锡钧记于西泠。^②

此跋文虽简短，但自著录、所在地、藏家、碑文作者考、书法风格、形制等方面皆有具体阐述，十分精详。其在跋自藏的《唐阙特勤碑》时更是逐一罗列前人的论述，如题志曰：

《唐阙特勤碑》，在三音诺颜之哲里梦以，地居漠北，游迹罕经，拓本流传绝少，故亦未见著录，至满洲志迁安氏出镇乌台始访得之。宣统三年，满洲三六桥氏出镇库伦复建亭护之南中，乃有拓本……此本系宣统二年以后所脱，视初拓本已缺一二字，然亦不可多得矣。兹付印并录日人所印诸家跋语于后。乙亥六月，淮阴陈伯衡并志。^③

题志后列有“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宗室盛昱记”“嘉兴沈曾植敬观题记”“瑞安黄绍箕识”“胶西柯劭忞记”“丙申十一月天壤孤子懿荣识”等论述数段，可见其于碑拓鉴定文献著录的注重，以及对鉴定的客观和严谨态度。

其碑版跋文中亦多次提到宋洪适《隶续》、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浙金石志》、方若《校碑随笔》、缪荃孙《艺风堂金石目》等，尤其是前文中提到其著有《翁松禅金石学》《叶鞠裳金石学》等，可见其对著录的重视和见其学术思想的来源。

① 浙江省博物馆编：《金石书画》第三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页。

②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十五期第一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③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二十八期第三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图9 《好大王墓砖》，见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二十二期第三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金石书画样样精通的陈伯衡，自然少不了如谢稚柳那般将艺术表达手法作为评价的一种依据和方法。如上文《隋城皋公扈使君碑》跋文中便以“碑字结构谨严，已开初唐风气”来进一步明确其年代和真伪。此类方式的运用亦不少，如跋《明晋王羲之黄庭经拓本册》时说：“《黄庭经》以淳熙秘阁本最为精审，其字体极似虞世南《夫子庙碑》，绝非越州诸刻所能望其项背。”^①又有评《好大王墓专》：“字作八分，视碑字尤为方整，盖专文之不可多得者。”^②（图9）此处不一一展开。

陈伯衡通常是针对不同作品而采取相应的研究、鉴定方法，以技术派和学术派的方式为主导，兼及艺术派，相对而言，更趋于严谨。这从他在《金石书画》刊物上刊载的藏品和其对其他作品的评论等处可以窥见。对碑拓的研究，尤其是从书画艺术的视角去分析碑帖，也同时会将研究所得反馈到陈伯衡的书法艺术体验和创作中去。

四、助益师友的金石碑版研究：以整理沈曾植藏品为例

作为身兼数职（都是极为重要的职务）的碑帖大家，又是西泠印社、东皋雅集（每周一会，持续十年）等社团的社员，自然与同道师友在金石碑版方面往来频繁。上文讲述陈伯衡、余绍宋携手一起推进金石书画的整理、研究、交易和书写等即是明证。此外，其助益师友的金石书画相关之事不胜枚举，如曾为邹寿祺藏《晋朱曼妻薛买地券》作记（1936年）；为叶为铭《歙县金石志》作序（1936年）；为陈涵度所藏的《黄庭内景经》（旧拓本）题跋（1941年）；为方若题写其藏《吴政聪为母叶三娘舍塔专记》（1943年）；为章劲宇藏弘一《断食日记》题写封面（1957年）；为沙孟海藏《西狭颂》（清拓本）题跋（1958年）。与余绍宋等一起为童大年在《金石书画》杂志上刊载润例（1934年）；力荐王一羽入王福庵之门（约1941年）；与徐森玉等一道介绍姚虞琴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1953年）等。

此处主要讨论陈伯衡对20世纪的泰斗级人物沈曾植藏品的整理，立体感受其助益彼时金石书法发展之功。陈伯衡虽与沈曾植相差30岁，但早年便与之熟识，民国初年一起同事于浙江通志局。如刘衍文在《寄庐茶座》中谈及陈伯衡时说：

民国初年浙江成立通志局修志，由著名的同光体诗人沈曾植（子培）先生主修时，陈先生

① 该作品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藏品编号为023591。

② 余绍宋编：《金石书画》第二十二期第三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就和沈先生共过事了，资格是最老的。^①

关于这一点，沈曾植在1918年写给谢凤孙的信中也有说起，其言：

伯衡辞馆之后，颇思留之在寓过年，相助料理。商诸仁先，为荐黄氏馆。他方尚有一小席可兼，约足抵关氏之数。舍间近有余屋，仅可安研。伯衡响学方殷，窃愿以传校之功，助其藏修之益。一举两得，公谓何如。^②

可见在同事关系之余，沈曾植对年轻的陈伯衡关照有加，既主动助其解决生活问题，还颇为欣赏其学问，并“愿以传校之功，助其藏修之益”，二人熟识程度可想而知。虽然这之后的交往时下可见的记载较少，但沈曾植下世数年之后，其嗣子沈慈护在整理其碑帖等藏品时，便邀请陈伯衡一同整理考订。笔者虽未能见到其整理的完整条目，但仅从所见的数件便能窥见沈慈护对其的推崇和信任，继而想见其在长者沈曾植心中的分量。

自1938年陈伯衡避居上海后，与沈慈护往来频繁。如1939年沈慈护请陈伯衡在沈曾植《临魏郑道昭碑轴》（图10）的墨迹旁补写未尽的句子。陈伯衡补临了28字后题款有言：

慈护道兄出示尊公乙庵尚书《临魏郑道昭碑》未完本，属为补足句意。尚书书法超轶隋唐，直追汉魏，并世书家罕与伦比。自惭薄学，何敢续貂，重违雅命，遂补写二十八字，并骥而走，流汗颠仆不足言已。己卯冬十一月，陈锡钧书时避地春申江上。^③

由该款文可知，沈慈护不仅对陈伯衡的金石研究水平极为肯定，还请其紧随沈曾植墨迹后补临如此多的字数，足见对其的信任和对其书法水平的认可。陈伯衡还曾专门写作品赠予沈慈护，如：1941年为其题写的扇面《现代朱峻人物、陈锡钧行书扇》^④书有小字行书200多字，极为精湛；1945年赠送的《民国陈锡钧隶书、朱峻画扇》^⑤作品上临写的后世惯常认为的其最擅长的《曹全碑》，等等。

之后几年，陈伯衡亦多为沈曾植藏品题跋，如1942年题《汉武梁祠何饴画像射阳石门画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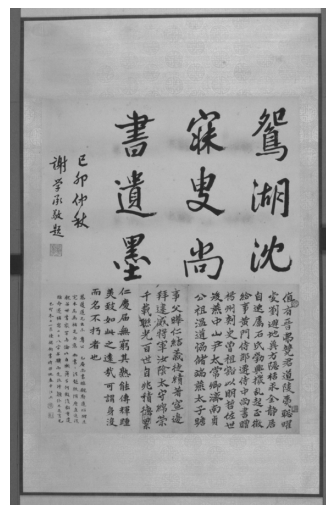


图10 清沈曾植《临魏郑道昭碑轴》，浙江省博物馆藏，藏品编号为025203

① 刘衍文：《寄庐茶座》，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61页。

② 沈曾植：《海日楼遗札·与谢复园》，《同声月刊》第四卷第三号（1944年11月15日），第53页。此信定为1918年所写，则是依据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74页。

③ 该作品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藏品编号为025203。

④ 该作品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藏品编号为017600。

⑤ 该作品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藏品编号为018477。

种》，其言：

此碑以同治辛未四月在嘉祥县出土。余别藏一整本，石门李笙渔跋于同治癸酉，何饌一榜，其第三行“勤体”二字已损。左半癸酉去辛未甫及三年，石已微损，此本“勤体”二字完全无缺，其为见碑即施毡蜡，可无疑义。旧为天津樊文卿彬、嘉兴沈子培曾植所藏，盖有樊、沈二先生印章，名人手迹，弥堪珍玩。壬午首夏，淮阴陈锡钧伯衡甫记于沪寓。^①

陈伯衡在品鉴《周大孟鼎铭文拓本轴》（图11）（1939年）时，除了题耑以外，还分两次录上沈曾植旧跋两则。^②另有《唐扶余隆墓志》（题耑、题跋，1942年）、《唐扶余隆墓志》（题耑，1942年）、《旧拓唐文林郎曩君墓志拓片》（题耑，1942年）、《唐熊津都督带方郡王抚余隆墓志》（题耑，1942年）、《黄庭经拓本册（宋翻刻秘阁本）》（图12）（题耑，1943年）、《晋王羲之黄庭经兰亭序拓本合册（刘公勇本）》（题耑，1943年）、《晋王羲之兰亭序拓本两种合册（颍上本、颍井本）》（题耑，1943年）等，许多藏品上还盖有陈伯衡的印章，如“伯衡曾观”“伯衡审定”“陈锡钧印”“石墨楼”等。

对于沈曾植的书法，陈伯衡亦时作评论。如其见到沈曾植在旧藏《兰亭序》（颍井本）上补“盛一觴是日也”六字时，在左侧题跋称誉：



图11 《周大孟鼎铭文拓本轴》（沈曾植旧藏），尺寸为115cm×26cm，浙江省博物馆藏，见浙江省博物馆编：《金石书画》第三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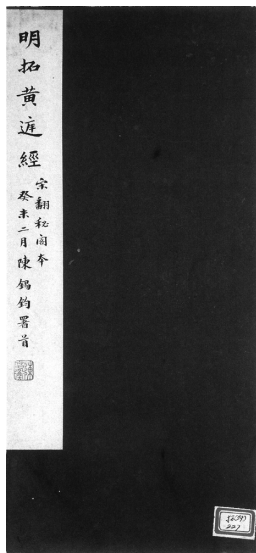


图12 《黄庭经拓本册（宋翻刻秘阁本）》封面，见浙江省博物馆编：《金石书画》第三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① 樊彬、沈曾植旧藏，陈伯衡、谢国桢题跋：《汉武梁祠何饌画像射阳石门画像二种》，见北京匡时2019年春季拍卖会。

② 浙江省博物馆编：《金石书画》第三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页。

右补六字系嘉兴沈文诚公笔，深得晋人三昧，以视仅求形似者，真有仙凡之别矣。^①

陈伯衡在为沈曾植书写的行书扇面（图13）题的长跋（沈字占一小半，陈字占大半，1943年）中称：

嘉兴沈文诚公精研帖学，造谊之深，不在翁覃溪、张叔未、吴荷屋之下。其作书也能取碑之长，以临帖复能采帖之长，以写碑铭汉晋于一炉，化南北之成见，有清一代书家，如刘东武、邓怀宁、包安吴、何道州皆莫或过之右。为先生书扇，遣墨虽未完，亦足窥见一斑。长君慈护道兄属为题志，因书所见，以志钦迟。癸未夏，陈锡钧谨识。^②



图13 清沈曾植《行书扇面》，浙江省博物馆藏，藏品编号为025229

沈曾植的书法高度，无需笔者赘言。陈伯衡在称誉沈曾植书法的同时，也走上了类似的路径，只是以端详静逸书风见长，寓奇崛于精妙之中，含萧散于谨严之内，时不时还有章草笔意跃出。虽然在面貌上与沈曾植相距甚远，但亦是近现代碑帖融合的一种面相。

陈伯衡还有一重要身份也为金石书画的切磋往来提供了方便，其常参与金石碑版的买卖，或自己买卖，或为他人作介、掌眼等。如余绍宋有记载：

陈伯衡来，略谈即去，杨丈见心属其来商，欲以《宝晋斋帖》相让，索价千元，余此时岂能任此。^③（1936年4月29日）

陈伯衡来，因出古董商何炳持来何氏旧藏碑帖百余种求售者，相与审阅。^④（1936年7月

① 陆易、陈翌伟作，郑峥屹摄影：《澹宕璨然：海日楼旧藏古籍碑帖撷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185页。

② 该作品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藏品编号为025229。

③ 黄国平、余晓主编：《龙游文库·余绍宋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53页。

④ 黄国平、余晓主编：《龙游文库·余绍宋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70页。

29日)

以上所列只是陈伯衡金石书画生涯中的一些片段，其为道友的助益远不止于此。

陈振濂先生在《“金石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一文中说：

在“金石学”方面，我们已可划出从马衡（20世纪20年代）、陈伯衡（20世纪60年代），到沙孟海（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三段式传统轨迹。^①

位列马衡与沙孟海之间，可见陈伯衡在西泠印社乃至浙江省、全国金石学界的分量，而后世于这一中间环节的研究还极为薄弱。虽然通过本文的分析可想见陈伯衡的金石书画成就之大，并通过具体案例作一定程度的实质性突破，但由于资料有限，许多方面还没能充分展开，无法全面把握和研究陈伯衡的成就和历史意义，只能以俟将来。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① 陈振濂：《“金石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艺术百家》2008年第3期，第14页。